

· 日常生活的哲学思考 ·

反思现代风险社会中的危与机

张庆熊

摘要: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造成这种风险的深层机制在于财富增长的逻辑与风险增长的逻辑不匹配。对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问题进行反思性研究是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只有增进人类大家庭集体的忧患意识,扩大国际合作,才能应对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风险。

关键词: 风险社会; 反思; 现代性; 世界主义

中图分类号: B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47(2021)02-0096-108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现代的大工业生产和高科技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高风险。但是这种风险常常被掩盖起来或遭到曲解。如何认识和应对这种风险?不仅要从技术的角度分析和处理,而且要进行社会理论上的反思,认清已有现代性的困局,寻求走向一种新的现代性。在当今生产和流通全球化的格局下,当今的风险也具有全球性的特征。为了应对这样的风险,不仅要考虑国内的因素,而且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出发,培养人类集体的忧患意识,建立全球性的应对风险的长效机制,才能为地球村的人民带来长久的幸福和安宁。

“风险社会”(Risikogesellschaft)这个概念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提出的。他在1986年发表了《风险社会:走向另一种现代性的道路》^①,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现代风险社会的原因和运作机制,倡导环境保护和世界

作者简介: 张庆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2017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方法论新形态及中国化研究”(项目编号:17JZD041)阶段性成果。

① Ulrich Beck, *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Frankfurt/M: Suhrkamp, 1986; 英译本参见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2; 中译本参见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主义，曾引起巨大反响。^① 这本书及其相关讨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一、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新常态

贝克有关风险社会是现代性新常态的论断值得重视。他的论断不仅基于事实，而且基于对迄今为止的现代社会运行机制的分析。1986年4月26日，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严重核泄漏事故。1986年10月25日，位于英国东南部的阿福什德镇发现了第一头患疯牛病的牛。这两个事故同一年发生，前者令人震撼，而后者在当时未曾引起足够重视，但其危害同样不容小觑。由于疯牛病的疾病因子在牛身上的潜伏期有五年，在人身上的潜伏期可长达数十年，开始隐而不显，等到发觉其情况严重时已经晚了。疯牛病后来在英国逐步蔓延开来，并流传到其他国家，2000年疯牛病在德、法等欧盟国家相继发作，是一场延续了10多年的危机。当今世界，化工厂的泄漏事件频繁发生，能源的过度排放造成空气污染，化肥和农药的过度使用造成土壤重金属含量超标，养殖业过量使用激素，转基因农作物被误导性推广。它们造成的危害是长远的，从引发恶劣天气到损害人的生殖系统，从根本上破坏了人类的环境家园和危及子孙后代的繁衍发展。贝克指出，在发达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化生产与高科技的社会化风险相伴随，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也同由高科技引发的高风险叠加在一起。“在风险社会中，在如此之多的烟雾警报、毒物泄漏等大大小小事件的推动下，灾难的政治潜能正在浮现。相关的防御和管控过程也就意味着权力与权限的重组。风险社会是一个灾难社会。在这样的危急情境下，例外状况也将成为常态了。”^②

人们常常把灾难当成一种例外状况。贝克强调在风险社会中“例外状况也将成为常态”，具有重要警示意义。现代化促进了技术的高度发展，人们对技术的依赖越来越大，人们相信技术能解决贫困、疾病等所有的问题，对高技术的发展满怀希望，对现代社会的进步充满乐观情绪。然而，高技术也带来高风险。技术不是万能

① 贝克有关风险社会思想后来的发展及国外讨论的著作可参见：Barbara Adam, Ulrich Beck and Joostvan Loon (eds.), *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 Critical Issues for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2000; Ulrich Beck, *Individu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London: Sage, 2002; Ulrich Beck, *The Cosmopolitan Vis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6; Ulrich Beck, *World at Risk*,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9; Ulrich Beck, *Twenty Observations on a World in Turmoil*,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0; Ulrich Beck, *Ulrich Beck: Pioneer in Cosmopolitan Sociology and Risk Society*, Heidelberg: Springer, 2014。国内讨论贝克风险社会思想的著作可参见：刘秦民：《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视角》，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张广利等：《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研究》，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相关著作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② Ulrich Beck, *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Frankfurt/M.: Suhrkamp, 1986, S. 31.

的,高科技是一把双刃剑。高科技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方面,无疑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高科技在加速财富增长的同时也加速风险的增长。技术必将带来社会的进步,这是19世纪以来社会理论中的普遍观点。这种社会理论给人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导致一种技术万能论。面对财富匮乏,人们相信可以通过高科技增加生产来解决;面对疾病,人们相信可以通过高科技来制造特效药;面对人生苦短,人们相信可以通过高科技来改善人生基因而延年益寿;面对生活情趣,人们相信可以通过高科技制造虚拟世界而纵情欢乐。人们相信,将来的一切辛苦劳作都将有机机器人来取代,世界上的一切财富将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人们可以尽情享受,无忧无虑。“例外状况也将成为常态”的论断告诫我们,现代科技制造的宏伟大厦是有可能崩塌的。古代社会的风险容易被看得到,面对各种自然灾害,人们感受到自然威力的强大和人力的微不足道,就像航行在大海中的小船面临狂风暴雨一样。用高科技改造过的人类居住的地球就像漂浮在茫茫宇宙中的飞船一样,是一个人工制造的内循环的封闭系统,有一点点的疏忽和漏洞都将导致没顶之灾。“例外状况也将成为常态”的论断告诫我们,我们不能只看到财富增长,而看不到风险增长。人们寄希望通过高科技有效地控制自然,但没有警觉它可能导致的各种未预期的负面效应。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自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没有约束的工业化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我们需要从一种盲目乐观的、技术会不断带来进步的社会理论中走出,正视“高科技的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的事实。

贝克分析了现代社会中风险的特点。古代也有风险,现代风险与古代风险有何区别呢?贝克认为现代风险具有“系统性”“不确定性”和“全球性”这三大特征。这三大特征使风险社会成为现代性的新常态。

现代风险的第一个特征是“系统性”。这种风险超出了局部的、个别人偶然遭遇到的范围,而具有全局性,影响全球整个的生态系统和全人类的安危。要克服这种风险,不是在局部的地方采取局部的措施所能解决的。古代也有风险,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古代的风险更加频繁:骑士会从马上摔下来,航船会遇到风浪沉没,风暴、地震、旱灾、水灾等风险古已有之。这样的风险容易看到;今天这些人遭遇,明天那些人遭遇;今年在这个地方发生,明年在那个地方发生。现代社会孕育了系统性的风险。这种风险是总体性的,总是在那里,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人类。工业化生产需要大量使用能源,导致碳排放增加,氟化物增加,气候变暖,臭氧空洞扩大,以及放射性、化工毒素和基因工程的风险所造成的危害超出局部的地域,对整体的自然环境和全人类的影响是长期性的和根本性的。这样的风险在一开始往往不易觉察到,而一旦发觉则已经晚了。它们引致系统性的、常常是不可逆的

危害。它们不能仅仅归于个别人的操作失误或偶然事故，而是由社会制度上的系统性原因造成的。尽管大工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生产财富而不是为了生产风险，但也不能说这类活动是完全清白无辜的。资本为追求财富往往铤而走险，或故意隐瞒风险，或把大量产生污染的风险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去。因此要从根本上克服这类风险，涉及整个社会制度乃至全球治理体系问题。

现代风险的第二个特征是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在于风险的概率而且在于风险的种类。古代农民耕作农田，他们知道会有旱涝灾害的风险；古代渔民下海捕鱼，他们知道会有遇到风暴的风险。这样的自然灾害是时常发生，尽管他们不知道在不久的将来自己是否会遭遇。对于这样的自然灾害的风险，现代人的认识加强了，甚至能够计算出它们发生的概率，保险公司能够根据这样的概率收取保险费和进行理赔。相比而言，现在社会中的风险主要在于不知道哪里会出问题，哪一种灾难会发生。英国的农牧民事先知道会发生疯牛病吗？他们不知道。直到出现了疯牛病，他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知道原因是什么。英国的农牧科技人员发现在饲料中添加动物蛋白可以提高奶牛的产奶量，他们在当时所做过的试验中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然而，这种疯牛病因子的潜伏期有 5 年，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现在所知道的许多风险，往往在一开始时并没有想到过，至少没有想到过会如此严重。例如，当初使用化肥的目的是提高农作物的产量，而没有预估到长期使用它们会对土壤和水源造成严重的污染。当初使用激素的目的是加速鱼、家禽、家畜的生长，而没有想到它们对食用者的生长发育的危害。记得 10 年前，我们在电视上经常可以看到有关人工快速养殖甲鱼之类的技术推广的节目，后来发现以这样方式养殖的甲鱼之类产品非但不是什么补品，而且有害健康。人类为提高生产力进行科技开发，这些创造发明是新事物，人类由此迈进了新的领域，遇到了新的不确定性。人们对新领域中的新事物的认识未免有限，人们容易只看到其有利的一面，而忽视其潜在的风险。

现代风险的第三个特征是全球化。现代社会是全球化的社会。随着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人口流动的全球化，风险也全球化了。风险古已有之，但在古代它们是区域化的风险，而在现代成为全球化的风险。疟疾、流感、肺炎、猪瘟等传染病古已有之。在古代，它们往往是区域性；它们会蔓延开来，但蔓延的速度比较慢。在现代，随着飞机、高铁等快捷的交通工具的普及，流行病的传播也迈入快速通道。100 年前发生的西班牙流感并非只在西班牙流行。疫情从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斯顿军营开始，随后流感传到了西班牙，医学界保守预计死亡人数约为 2000 万，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还多。非洲猪瘟顾名思义是一种非洲的猪瘟传染病，但 2018

年至2019年在全中国蔓延,导致全国各地生猪大量宰杀,以至于肉价高涨。现代风险的全球化特征造成了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必须时刻警惕世界范围内风险的存在和传播。

二、财富分配的逻辑和风险分配的逻辑

有关高科技带来高风险的问题,在贝克之前,已有很多学者论述过。例如,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从伦理学的角度论述现代技术文明时代的责任原理。^①贝克的主要贡献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风险社会的特征和规律。他论述在高科技的现代社会中财富分配的逻辑和风险分配的逻辑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关系将决定现代社会的命运。

按照贝克的看法,在古典工业化的现代性中,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财富生产与财富分配之间的关系不合理,有产阶级的富裕与无产阶级的赤贫两极化;在发达工业化的现代性中,财富分配的矛盾与风险分配的矛盾叠加起来,不仅财富分配不合理,而且风险分配也不合理。为什么财富的分配会不合理呢?因为资本支配着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导致广大劳工阶层在财富分配中陷于不利地位。为什么风险的分配会不合理呢?因为资本为追求利润往往忽视风险进行生产,并把高风险分配给穷人,转移到贫困地区。

贝克认为,有关古典工业化的现代性,马克思和韦伯等社会理论家已有充分论述。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分配规律;资本对劳工的剥削导致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将推动社会制度的革命。韦伯论证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合理化;资本主义通过大规模生产、精细分工、科层化管理、尽可能节约生产和流通的成本等一系列合理化方式,使财富充分涌流出来;然而,这种追求生产效益合理化的负面效应是工具理性的泛滥,并以此为一切现行的社会制度辩护。按照贝克的看法,马克思和韦伯的社会理论适用于分析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社会”或“阶级社会”的概念在韦伯和马克思那里主要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即社会化生产的财富如何以一种社会不平等而又貌似“合法”的方式进行分配。马克思和韦伯所讨论的有关工业社会或阶级社会的财富分配的逻辑问题与他所讨论的风险分配的逻辑问题有牵连,但他们的视角和途径不足以解决现代风险社会的

^① 参见汉斯·约纳斯:《责任原理:现代技术文明伦理学的尝试》,方秋明译,香港:世纪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

问题。^①

贝克认为,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物质财富短缺是社会的核心问题,人们寄希望于社会化大生产增长物质财富。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像联邦德国这样发达工业化社会中,物质财富短缺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物质财富分配的矛盾也通过社会福利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这时占据社会中心舞台的矛盾已经从财富分配的逻辑转化为风险分配的逻辑。从全球的角度看,短缺社会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依然面临饥荒和缺衣少食的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主要关心的问题应是风险分配的逻辑,而发展中国家主要关心的问题应是财富分配的逻辑。因为在全球化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惯常的做法是把风险生产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中去,在那里饥饿问题与环境污染问题叠加在一起。贝克在《风险社会》和后来的《风险中的世界》(*World at Risk*)等著作中对此的特点和规律进行了梳理。我觉得以下几点值得关注,至今还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风险分配的逻辑沿着从富国向穷国的方向转移。在西方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并非没有生产风险以及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根据历史记载的材料,19世纪英国的天空笼罩浓浓的煤烟气,酸雨不断,很多人肺部感染和皮肤腐烂,跌入泰晤士河中的船员和乘客不是因为溺水而亡,而是因为被污水呛死。在德国等欧洲工业化国家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而如今欧洲的河流变得干净了,天空变蓝了,大地又披上了绿装。相比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第三世界国家因为贫困向风险买单。“饥饿的魔鬼与风险增强的魔王交战。特别具有风险的行业被转移到贫穷的边缘国家。第三世界的贫困与发达风险工业放纵的破坏力量可怕地结合在一起。”^②这是全球化时代风险分配逻辑的路线图。

(二)风险分配的逻辑沿着从富人向穷人的方向转移。风险分配的历史表明,风险像财富一样附着在阶级模式上,只不过以颠倒的方式进行运作:财富向上层聚集,而风险向下层聚集。越富的人越容易回避风险,越穷的人越容易面临风险。富人可以用金钱购买保险和获得规避风险的特权,而穷人因贫困无力购买医疗、财产等保险而更易招致不幸的灾难。有钱人一旦出了事故可以住在高级病房里得到良好的治疗。买不起保险的打工者一旦出了事故只能自认倒霉。无产阶级居住在临近烟囱的地方,穷人区分布在精炼厂和化工厂的旁边,因为那里的地价便宜,而且无需开车去上班。富人纷纷迁移到远离工业污染和绿树成荫的郊外居住,享受

^① Cf. Ulrich Beck, *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S. 25—26.

^② Ibid., S. 56.

田园诗般的生活。风险在不同职业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散发毒气、高辐射、频发事故的工作大都由外来移民和临时工来从事。处理工业污染物和医院中的疾病污染物的工作往往承包给受教育程度差和收入低下的保洁工。风险在饮食和休闲娱乐中的分配也同样如此。富人吃健康食品，穷人吃垃圾食品。你若花钱无忧，可以去吃有机的蔬菜、散养的鸡蛋、深海的鳕鱼和自然生长的肉类。如果你不得不省钱，就只能购买转基因的、靠激素催生的食品来填饱肚子。富人在环境优美和安静的高档酒店度假，享受着日光浴和新鲜空气。穷人在嘈杂、肮脏、吵闹的街道上奔波。由此可见，阶级社会和风险社会在很大范围相互重叠，阶级地位的不平等与风险分配的不平等无情地结合在了一起，不公正的风险分配加剧了阶级对抗。

(三)资本为风险分配的逻辑寻找辩护理由。资本的目的是追求利润，这是资本甘冒风险进行投资和生产的真实理由。然而，资本总能为这种风险的生产和分配找到种种说辞。其中，风险生产是为了克服物质短缺是最重要的说辞。现代化生产促进了财富的增长，在西方的某些发达国家生活资料的供应已经大为改善，但是就全球而言依然是个短缺社会，第三世界国家依然面临粮食短缺、能源短缺等严重问题；缺衣少食、营养不良依然是广大下层人民面临的紧迫问题。即便在富裕工业国家，当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也会面临大量劳工失业的问题。这时严格按照环境保护和风险防控的标准管理生产和限制生产与放松管控和扩大生产往往形成一对矛盾。面对这种情况，为资本服务的政客就容易找到借口，声称促进经济复苏享有无可置疑的首要地位，只有国内生产总值迅速增长才能解决失业问题，并为进一步的环境保护创造先决条件。在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辞掩盖下，他们要求环保管制更松懈一点，污染排放更扩大一些，食品安全标准更放松一些，甚至阻止任何对食物中有毒残余的调查。他们宣称：环保是长远的问题，气候变暖是虚假的问题；风险历来都有，为担心风险限制生产要比风险本身的后果严重得多；因交通事故死的人要比由于化工厂爆炸死的人多得多，粮食短缺饿死的人要比因吃重金属含量高的农作物而死的人多得多。他们雇佣一些所谓专业人士进行认证，表明绿色和平运动和环保主义者所说的那些风险是“未经证实的”和不必要的“杞人忧天”，农药、化肥、转基因农作物、动物饲养的激素和某些食物添加剂对土地、人和动物的危害被称作“骇人听闻的夸张”。即使它们有点不良影响，为了解决地球上数亿人的饥饿和就业问题，也应该被忍受，等待将来的人类想办法解决。如果一旦出了事故，资本也很容易推卸责任，那是由于下层管理者的管理不当或临时工的操作不当所致。如果那是跨国企业在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的事故，那很容易从那里的法律不全或司法混乱为

自己找到辩护理由。

(四) 风险分配的逻辑终究将使所有的人招致厄运。尽管风险分配的逻辑具有阶级的不平等性,但它的发展方向是使得所有的人终将灾难临头。在一定的条件下,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可以凭借自己拥有的金钱和财富暂时回避风险,但他们躲得了一时,躲不了终究,躲得了这里,躲不了那里。工业现代性的风险同样会冲击那些生产它们和得益于它们的人。从根本上说,这种风险具有一种打破阶级、民族和地域的“飞去来器效应”(Bumerang-Effekt)。^①生态灾难和核泄漏不在乎国家边界,沙尘暴和雾霾可以危害到受其影响的所有的人。工业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森林资源而大量采伐欠发达国家的热带雨林,为了保持本国的河流干净而把大量的化工厂迁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利润不顾安全的生产和大量排放污染物,势必危及全球的生态体系和引发跨越国境的风险问题,终究会像飞出去又弹射回来的武器一样伤及自己。现代性的风险归根到底是世界性的风险,是影响子孙万代的风险。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风险不分贫富贵贱,不分种族和国界,对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构成威胁。在现代性的风险面前,终究没有个别的赢家和输家,只有全人类共同努力,寻求全球化的治理方案,才能共赢。

三、反思的现代化与世界主义

“反思的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这个概念并非贝克独创。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也阐发了他们各自有关反思的现代化的观点。这三个人使用同一个术语,在互相争辩和互相借鉴中发展自己的观点。如何说清楚他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贝克注意到这一点,力图澄清由此可能引起的误解。他写道:“很难避免对‘反思性’(reflexivity)概念的误解。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和我在两个不同而又交叉的方向上发展了反思的现代化的概念和理论。依据第一种看法(以吉登斯和拉什为代表),反思的现代化主要联系到对现代化的基础、后果和问题的认知(反思)(这与该术语的字面意义保持一致)。在以我的论点为代表的第二种看法中,反思的现代化主要是现代化的副作用的结果(这乍一看似乎与字面意思不一致)。在第一种情况下,人们能够谈论(狭义理解上)的反思(reflection);在第二种情况下,人们能够谈论(更广义上的)反思性(reflexivity),因为广义上的反思性(reflexivity)除了反思(认知)

^① Ulrich Beck, *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S. 48—49.

的含义外还涉及一种‘反射作用’(reflex)的观念,即对无一知(non-knowing)的(防范)反应。(然而这个术语很不幸,因为它会引起误解。)”^①

有鉴于贝克区分“reflection”和“reflexivity”,有些学者主张把“reflection”翻译为“反思”,把“reflexivity”翻译为“反身性”“自反性”“反射性”。但我觉得这可能会带来另一些问题。一则因为“reflection”的字面含义不仅仅是反思,它的原初含义是“反映”“反射”,反映论“reflectionism”就源于这个词。二则因为吉登斯、拉什和贝克都使用同样的词汇来表达“反思的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如果在吉登斯、拉什那里翻译为“反思的现代化”,在贝克那里翻译为“反身性现代化”或“自反性现代化”,又会引起新的混乱。

贝克虽然强调现代化的“副作用”和风险所包含的“无一知”的一面,但并不否定知识层面上的反思的必要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因此,当我参照安东尼·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来解释反思的现代化时,我也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我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尽管我们三个人都包括了认知方面,吉登斯和拉什却没有认识到副作用和“无一知”的重要性。”^②在我看来,贝克从风险社会的角度论述反思的现代性,吉登斯从结构化的社会理论的角度论述反思的现代性,拉什从审美情感和批评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的角度论述反思的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是一个学术的共同体,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互补。通过对照吉登斯和拉什与贝克观点上的异同,更能说清楚贝克有关反思的现代性的思想。

让我们从吉登斯说起。吉登斯非常明确地从认知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上谈论“反思的现代化”。他写道:“人类行动者认知能力所特有的反思性特征,是社会实践循环往复的安排过程中根深蒂固的要素,实践的连续性是以反思性为假设前提的,但反过来,实践之所以可能具有反思性,又恰恰是由于它存在连续性,使得实践在时空向度上体现出独特的‘同类性’(the same)。因此,我们应该把反思性理解为持续发生的社会生活流受到监控的特征,而不仅仅是‘自我意识’。”^③

“反思”这个概念具有多层含义。可以从个体的层次上谈反思,也可以从社会的层次上谈反思。在以往的哲学中,特别是在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近代主体主义哲学和现象学那里,“反思”主要被理解为一种个体层次上的自我意识的方式。贝克、吉登斯和拉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已经突破个体性而在社会层面上探讨反思。吉登

① Ulrich Beck, *World at Risk*,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9, p. 119.

② Ibid., p. 120.

③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

斯把社会层面上的反思理解为一种社会的自行监控和自行纠错的机制。个体通过反思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自我审视,社会通过反思对社会活动进行监控。社会的发展依赖于反思层面上的改进。我们不能等待社会出现重大问题、发生重大震荡、遭到重大破坏后再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应该引入一种自身检察的机制及时发现问题和防患于未然。吉登斯引入“反思的现代化”这一概念是为了通过反思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功过成败探寻现代化的原因、规律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吉登斯阐发政治和知识层面上的反思对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吉登斯把现代国家看作具有反馈能力的监视系统,现代国家建立了一种使自己的官僚队伍及其行政决策受到监视的机制,通过议会、监察机构和舆论进行多重监督。吉登斯还认为,除了政治上的反思,对知识的反思也非常重要。知识在现代化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知识不仅储存在人的大脑中,而且储存在社会中。现代社会是一个研究知识、储存知识和传播知识的大宝库。现代的科研机制、图书馆、传媒网络和国民教育体系是生产、储存、传播和培养现代知识的重要方式。但知识需要更新,人的认知方式需要改进,教育需要兼顾社会平等的问题。因此,如何自觉地通过建立一种社会机制来反思人在知识的获取和改进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是当今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任务。

贝克认为吉登斯在政治和知识层面对反思现代化的探讨存在两个严重疏忽。从风险社会的角度看,吉登斯没有考虑财富分配的逻辑与风险分配的逻辑的关系。在现行资本追求财富的逻辑的支配下,现有的国家体制无法完成对风险分配的有效监管。吉登斯对现代化的反思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上,好像只要认知水准提高了,获得更多更好的知识,就能克服现代化的风险。吉登斯所说的对知识的监控只关注已知的一面,疏忽未知的一面。然而,生活在现代风险社会中意味着生活在无法根除的不确定性中。现代科学知识在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又开辟了新的不确定性和未知的领域。人们没有预料到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的爆炸,人们没有预料到放射性、某些食物添加剂、激素所导致的人类生殖和免疫系统能力的下降,人们也没有预料到化石燃料的使用导致气候变暖和恶劣天气的频繁发生。受资本雇佣的专家往往对公众进行误导,现代人往往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遭遇灾难和面临生死抉择。由此导致现代社会的种种悖论:技术越高风险越大,专家越多误导越多,商业宣传越安全越不安全。现代社会并非是知识万能的社会,人们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无知的问题。临时的无知、故意的无知、莫名的无知、防范的无知,纷纷映入人们的眼帘,渗透并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

贝克是否持一种反知主义的立场呢?贝克否认自己是反知主义。他解释说,

他谈论“无一知”不是不要知识,而是关注“知识”(Knowledge)与“无一知”(Non-Knowing)之间的张力,把它们作为“反思现代化的两个方面”来考虑。^①其认证方式有点像苏格拉底所说的“我自知我无知”。对于临时的无知,可以通过学习把未知转化为已知。对于故意的无知,可以通过告知真相去揭穿假装的无知,例如揭示其为了盈利的目的故意掩盖真实风险情况。现代社会中的风险有一种“时空远离”的特征,它不像前工业社会时期人们能够直接经验到火之类的风险那样知道“火作小心”;普通人大都不明白现代工业设备中所部署的各种技术知识及其风险,对此容易产生莫名的无知。由于这种对现代科学技术的莫名其妙的恐惧,要退回到前工业社会田园诗画的生活中去吗?贝克对此也持反对立场,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梦游。贝克特别看重防范的无知:我们不知道风险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灾难什么时候发生,但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警惕,要从制度的层面上采取措施,防范风险于未然。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你不知道,你怎么能够防范呢?贝克的回答是:风险是现代化的副产品,灾难性的事故已经一再发生,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我们所不知道的是新的风险的种类、具体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我们知道高风险的存在,我们知道现有的体制和思维方式无从应对风险,所以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加以转变。防范的“无知”意味着态度上的一种根本的转变,这要比自认为“有知”能更好地应对风险,这是反思“无一知”导致的积极结果。

拉什主要通过审美情感和社群主义探讨反思的现代化。他借鉴康德的理论,区分了认知反思、道德反思和审美反思。他认为早期的现代化只重视认知理性和主体主义的道德,这导致工具理性和人对自然剥夺的傲慢态度,而“审美反思性”渐渐在晚近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社会过程发挥作用。他主张发扬人与自然协和共生的审美情感,批评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和任凭市场左右的现代生活方式,倡导建构一种新的社群主义。^②

贝克认为拉什对反思现代性的论述太虚无缥缈,对风险社会的评论停留在浪漫主义和门外汉的层次上。现代化自身发展的逻辑不是走向什么审美情感的“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而是“更多现代性”(more-modernity),但这导致现代性自身的原理与现代性现存体制之间的矛盾。他写道:“现代性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的区分打开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性的各种辩证法:更多现代性(而非后现代性)的困境与反现代性的困境。”^③

① Cf. Ulrich Beck, *World at Risk*, p. 115.

② 参见斯科特·拉什、约翰·厄里:《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3—77页。

③ Ulrich Beck, *World at Risk*, p. 231.

在贝克看来,资本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借助高科技实现大工业的生产,扩展世界市场,并按照资本进行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这条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或基本逻辑还在继续生效:高科技和大工业还会进一步发展,分工还在进一步细化,管理还在进一步科层化,社会还在进一步贫富两极分化;大规模失业,家庭破碎,人口老龄化,流动人口增加,难民问题严重,福利国家的改革面临失败,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世界范围的风险和发生灾难的可能性与日俱增。这就是“更多现代性”。面对现代性的种种问题出现一种“反现代性”的思潮。“反现代性”并不标志“后现代性”阶段的到来,而是标志一种不确定性和迷茫性。后现代主义是与这种反现代性思潮相结为伴的。但是这种思潮只是在消极意义上反对现代性,因为它没有把握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或基本逻辑,而是以浪漫主义的幻想和悲愤激昂的情感面对现实;虽然能激起所谓后现代“小叙事”的一片片反抗的浪花,却不能扭转现代性“大叙事”的基本运行方式。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不切实际,因为现实世界中出现的情况是更多现代性,而不是后现代的天方夜谭。

那么,出路究竟在哪里呢?出路在于在危机中寻找机遇。现代性的基本运行原则与现代性的现存制度之间出现了张力,意味着必须改变现存的制度。这既是一种困境又是一种出路。用贝克自己的话来说:“因此,更多现代性的辩证法既是危机,也不是危机。简而言之:基本原则的连续性(它们的定义性的丧失和它们的反思性的增加)导致了基本制度的非连续性。”^①

在贝克看来,现代性的现存制度是以保护本国资本为宗旨的民族国家的治理体制。这种治理体制在风险社会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已经不适用了。当灾难在全球范围发生的时候,民粹主义的政治家会采取“有组织的不负责任”^②的态度,推诿甩锅,完全无法应对全球性的风险危机。在今天,单一民族国家的现代性的制度基础已经失效,或者至少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自我封闭的国家治理体制并非永恒不朽。马克思已经向我们表明,资本的无限动能已经把孤立的国家和各族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现在风险社会的现实告诉我们,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存在“超越边界的相互关系”,他们相互依存,因果相连,是需要共同承担责任和团结合作的“命运共同体”(communities of fate)。^③“单边主义的国家政策现在是向后看的观念

① Ulrich Beck, *World at Risk*, p. 231.

② Barbara Adam, Ulrich Beck and Joostvan Loon (eds.), *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 Critical Issues for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2000, p. 224.

③ Ulrich Beck, *World at Risk*, p. 233.

论；国际合作是新政治现实主义的核心。民族孤立主义是一种幻觉、一种虚构、一种遗留物——它会适得其反，注定会失败。……世界风险社会可能会让民族国家的全球秩序发生头足倒立的变化：不是民族国家的主权使得合作成为可能，而是跨国合作使得民族国家的主权成为可能。”^① 贝克把他的这一主张称为“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②

乌尔里希·贝克已于2015年1月1日逝世，但他有关风险社会的思想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斗争的理念依然影响深远。近几年来西方民粹主义势力抬头，右翼政客为了转移国内民众对贫富不均和社会治理失误不满的视线，借移民问题、难民问题、贸易问题等煽动排外情绪，把国际气候合作、全民医保和全球疾病防空等议题压制下去，把气候变暖说成是一个伪命题。当今世界依然处在财富分配的逻辑与风险分配的逻辑的尖锐矛盾之中。国际主义与民粹主义交锋；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与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对抗；对风险采取积极防控的态度与屈从于选举等政治逻辑的不作为和乱作为形成鲜明对照。全球化时代的风险超越国界，不分种族。贝克发出的声音依然回荡在我们耳边：人类是一个大家庭，同患难，共命运；面对现代风险，只有全人类团结起来共同应对，才能化险为夷，迎来机遇。

（责任编辑：牛婷婷）

① Ulrich Beck, *World at Risk*, p. 233.

② *Ibid.*, pp. 61—62. Cf. Ulrich Beck, *The Cosmopolitan Vis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6, pp. 175—177.

Key words: Wittgenstein; the principle of simplicity; metaphysics; tension

- Freedom under the Category of Causality: On Heidegger's Reading of Kant's Conception of Freedom

ZHAO Meng

Abstract: Kant's critical philosophy tries to defend human freedom by laying its foundation on the spontaneity and autonomy of human subject. In his interpretation of Kant's notion of freedom, Heidegger believes that Kant's understanding of freedom in terms of causation denies human freedom. A faithful reconstruction of Kant's theory of causal freedom can clarify Heidegger's misinterpretation. Further, an analysis of Heidegger's own position will disclose the ontological-phenomenological dimension of freedom in Heidegger's thoughts. By juxtaposing these two views on freedom, we can more clearly find that Kant's theory of freedom continues the undertaking of enlightenment for championing the self-sufficiency of human subjectivity.

Key words: Kant; Heidegger; freedom; category of causality

- Reflexion of the Crisis and Opportunity in the Modern Risk Society

ZHANG Qingxiang

Abstract: Modern society is a risk society.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this risk lies in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logic of wealth growth and the logic of risk growth.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us to make a reflexive study on the risk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only by enhancing the collective awareness of the human family and expand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an we cope with the risks common to all mankind.

Key words: risk society; reflexion; modernity; cosmopolitanism

- Psychological Egoism and Hobbes

HUN Chung

Abstract: Many commentators think that Hobbes was committed to psychological egoism. Psychological egoism is a theory of human psychology claiming that all human actions are ultimately motivated solely by one's own self-interest. In this paper, I argue that there are reasons to think that Hobbes was not committed to psychological egoism in any of its plausible formulations

Key words: Hobbes; Psychological egoism; psychological hedonism; tautological; egoism; motivation

- Quantum Entanglement and Quantum Informational Structural Realism

LI Hongfang

Abstract: In the 21st centu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quantum informational theory and quantum communicational technology, physicists have proposed some important concepts and theories, such as "it from qubit", "qubit and quantum long-range entanglement together form quantum topological states of matter which generated the universe everything including the space-time structure." More important, "quantum information equals to quantum matter".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give a forward-looking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 of the frontier of quantum informational science in order to build our new scientific realism of quantum informational world.

Key words: quantum information; quantum matter; qubit long-range entanglement; quantum informational structural realism

- Trans-empiricality and Its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of Superstring Theory *WU Guolin FU Ming*

Abstract: Superstring theory is the most cutting-edge theory in modern physics. Quantum cannot reveal the